



张家界土家语地名诠释

ZHANGJIAJIE TUJIAYU DIMING QUANSHI

永定区 武陵源区·上册

YONGDING QU WULINGYUAN Q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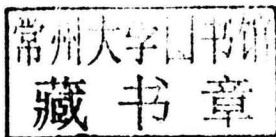
尚立昆 尚立晰 /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张家界土家语地名诠释

永定区 武陵源区·上册

尚立昆 尚立晰 /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前 言

5年前，得知我退居二线，族兄立昆便邀我共同编写《张家界土家语地名诠释》。在听了他的构想后，我没多作考虑便爽快地答应了。

之所以爽快答应，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土家族是张家界市的主体民族，且历史悠久，其文化积淀极其深厚。土家语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土家族有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土家语在传承土家族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没有载体——文字的语言，已经濒临消失。编写这样一本书，可以使这一濒临消失的语言得以用书面的形式部分地永久传承，可以说这是对土家语这一土家族文化的一种抢救性工作，此其一。自1957年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以来，土家族地区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土家族文化的研究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也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土家语的研究有了突破。20世纪80年代初，吉首大学副教授彭秀模、叶德书两位先生采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结合土家族语言编制了一套土家语拼音方案，这是土家语研究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土家语拼音方案能把土家语正确地记录下来，使之达到便于研究和交流的目的，并能使土家语世代传承。但是总体来说，对土家语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成果也不是很多。笔者孤陋寡闻，目前见到的这方面的专著，还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已故教授罗安源等4位同志合著的《土家人与土家语》，叶德书和向熙勤两位同志合著的《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张伟权先生编著的《土家语汉语词典》。但是这些都是他山之石。在张家界市，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编写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填补了张家界市在这方面的空白，此其二。张家界自古以来就是土家人的家园，几千年的生产生活、繁衍生息，形成和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土家语地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土家人中懂本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大多都转用了汉语，对土家语反而知之甚少，致使不少用汉字记录的土家语地名在一些资料和言传中出现误记误解。张家界

是新兴的旅游地区，不少客人对这里的一些地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我们的导游和陪同，由于不懂土家语，在解释时或错误地“照本宣科”，或信口开河，以致闹出不少笑话，泯灭了土家族的文化。编写这样一本书，实事求是地从这些地名的显性形态（语音、语法、结构等）和隐性内涵（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美学观念等）两个方面，准确地诠释其含义、来历及其演变，就能够匡正讹传和曲解，正本清源，从而还原土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此其三。

之所以爽快答应，还因为我对编好这本书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主要还不是“自信”，而是“他信”，即对立昆兄的了解。编著此类书，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定的文字表述能力；二是谙熟包括土家语在内的土家族文化。这后一条尤其重要，这也是一般人能写出种种鸿篇巨著，却不能编著此类著作的原因。我和立昆兄同族同宗，同乡同村，他长我10岁，于我是亦兄亦师。据我了解，这两个条件他都是具备的，而且是优秀的。20世纪60年代，立昆兄进入湖南艺术学校，学习戏曲创作，在这里，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字表述和创作基础。参加工作直到退休前，曾有数十篇专业论文见报见刊，数部个人专著问世。因此，编著此书，在文字表述方面当是不成问题的。立昆兄的“帕普”（祖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梯玛”，“帕普”、“阿巴”（祖母）均操一口地道的土家语。立昆兄儿时就是“帕普”、“阿巴”的一个小尾巴，学、说土家语与汉语几乎是齐头并进。参加工作后，他对土家语又有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就懂土家语而言，在张家界除他外，恐再没有第二人。立昆兄从6岁起就开始学唱桑植民歌、学跳花灯舞，学打花鼓、九子鞭、莲花闹等民族民间曲艺；学打溜子、打围鼓，吹咚咚喹等民族乐器。从9岁起，先后参加了3个傩坛，充当一名小梯玛，跟着“帕普”学演傩戏、跳傩舞，学唱《梯玛神歌》、《舍巴歌》，学跳《八宝铜铃舞》、《摆手舞》，可以说从小就受古老民族艺术的滋润和熏陶。参加工作后，除7年从事行政工作外，其余时间全在文化部门，主要从事的又是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文物考古工作。这样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张家界地区土家族文化研究屈指可数的专家。由上可见，编著这本书，立昆兄是完全可以独立完成的；拉上我，做一些文字编辑等方面的辅助性工作，只不过想少一些劳心费神，因为毕竟年逾古稀，精力有限。

二

经过6年多的编撰，书稿终成，定名《张家界市土家语地名诠释》（以下简称《诠释》）。全书共收录土家语地名2210个，另收录同一地域（乡镇）汉字记录有异但汉语义相同实为同一土家语的地名近百个，因此实际收录地名2300多个。这些地名覆盖张家界市两区、两县101个乡镇的几乎全部行政村，对应的土家语词汇近千条，这些词汇涉及自然、社会、生产、生活、宗教等方方面面。考虑到这些地名总是在一定的行政区划地域内，只有在特定的地域内，它才是土家语地名。因此《诠释》在编序上采取按行政区划“划块”，即以区县成篇，以乡镇为单元。

《诠释》在参考借鉴同类著作的叙述方法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第一，在记录土家语时，以土家语拼音为主，汉字记音为辅，这与已有的同类著作的记录方法正好相反。作这样的处理，更符合土家语的实际。我们知道，土家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也就是说，土家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符号即文字，书面表现土家语只有通过记音来实现。在没有土家语拼音的情况下，人们只有选择汉字为其记音，舍此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是，有了土家语拼音以后就不一样了，土家语拼音比汉字的发音更接近被记录的土家语的实际发音。因此，本书采用以土家语拼音为主记录土家语；同时，考虑到大多数人不了解土家语拼音的实际，又辅助以汉字记音。这样，就兼顾到了各个方面。采用以土家语拼音记音为主，汉字记音为辅的记述方法，表述效果要更好一些。不妨以对“龙借”这个土家语地名的诠释为例来作一个比较。先看按传统的即以汉字记音为主，土家语拼音为辅的表述：

“龙借(luŋ⁵⁵tɕie³⁵)”是土家语，汉语义是“裙”、“裙子”。

再看按本书的即以土家语拼音为主、汉字记音为辅的表述：

“龙借”是土家语luŋ⁵⁵tɕie³⁵的汉字记音，土家语luŋ⁵⁵tɕie³⁵（龙借）的汉语义是“裙”、“裙子”。

前一种表述给人们的信息和印象是：汉字“龙借”是土家语，而土家语拼音luŋ⁵⁵tɕie³⁵是为汉字“龙借”注音的。这显然不是编著者的本义。后一种表述则不一样，它明确的表示，“龙借”没有任何汉语义，仅仅是土

家语 $luŋ^{55}tɕie^{35}$ 的记音。显然这更符合实际。

第二，在用汉字为土家语记音时，尽可能地选用与土家语拼音注音同音的汉字。同其他语言一样，由于地域不同，土家语的语音和词汇也存在一些差别。从大的方面讲，土家语可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北部方言分布于湘西北（湘西州的永、龙、保、吉四县市，张家界市的四个区县，常德市的石门县）及其周边的鄂、渝、川、黔的一些县；南部方言分布在湘西州的泸溪县的大、小陂流村。两大方言之间语音和词汇差别很大，难以对话交流，且操南部方言的土家族人口不足千人。因此，本书在为土家语记音时对南部方言不予考虑。北部方言区域内的东部区（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的石门县）和西部区（北部方言区除东部区之外的其他地区）之间的语音也存在一些差异，最显著的是西部区的语音声母中没有汉语拼音的 zh（知）、ch（痴）、sh（诗）等卷舌音，凡 zh（知）、ch（痴）、sh（诗）音一律分别发为 z（资）、c（雌）、s（思）音。韵母中没有撮口呼 ü（迂）音，凡 ü（迂）音一律发为 i（衣）音；韵母中也没有带后鼻音的 ang（昂）音，凡 ang（昂）音一律发为 an（安）音。而东部区 zh、ch、sh 与 z、c、s 发音分明，i 与 ü、an 与 ang 发音也分明。但是，土家语拼音方案是根据西部区的土家语语音编制的，这就使得在为东部区一些语音用土家语拼音方案注音和用汉字记音时陷入两难境地：用与土家语拼音注音同音的汉字记音，会与当地的实际发音不符；用与当地实际发音相符的汉字记音，又会与土家语拼音注音不一致。权衡利弊，《诠释》在用汉字为土家语记音时，选择了与土家语拼音注音同音的汉字（对个别语音按东部区的发音应如何记音给以适当的说明），这样处理，能使汉字记音与土家语拼音注音保持一致，而且也与土家族人口占大多数的西部区的土家语语音相吻合。

第三，在用汉字为土家语记音时，一律用普通话汉字，而不是用方言汉字。我们知道，用来给土家语记音的汉字，是不表示任何汉语义的，它的作用，而且是唯一的作用就是记音，因此，用来记音的汉字越接近被记录的土家语的实际发音越好。以往的一些同类著作，在为土家语记音时，都是采用西南官话（武陵山区方言）汉字。采用方言记录土家语最大的优点是，对于操方言的人群来说，根据汉字就能读出土家语。但是，武陵山区的方言与普通话的发音差别较大，某些汉字按方言发音固然与被记录的土家语的发音相同或相近，但用普通话来读，可能就相差很远了。现在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操方言、懂方言的人越来越少，用方言记录土家

语，适应的读者层面必然会受到限制；而且，即便是在武陵山区内，各地的方言也不尽相同，用方言记录土家语，也会带来地域局限。采用普通话记录土家语，不仅能忠实地表现土家语的读音，而且更“大众化”，能突破人群和地域的局限。

第四，对土家语地名的诠释，既注意准确阐明它的含义，又注意揭示它所包含的土家文化。本书对土家语地名的诠释，一般按以下几个层次阐述：阐明该地名是纯粹的土家语地名，还是土家语与汉语结合运用的地名；阐明其演变过程；详细诠释该地名中土家语部分的汉语含义；阐明该地名得名的缘由；对有特殊含义的地名，作相关的说明和介绍。这样阐述，不仅诠释了地名的含义，还“带”出了与之紧密相联的一些土家文化。如土家人的宗教“还神愿”，建筑艺术“转角楼”，婚嫁习俗“哭嫁”，以及服饰方面的“西兰卡普”、“裉裤”，饮食方面的“团馓”、“豆豉”，生产活动方面的“砍火畲”、“赶仗”，居住方面的“干栏”、“土筑墙”、“风火房”，等等，书中在对相关地名作诠释时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这就使本书的价值得以拓展，即既有诠释地名含义的价值，又有从多方面展示、弘扬土家文化的价值。

以上尝试，是弄巧成拙，还是有益的探索，只有留给读者来评判了。当然，更期望得到方家的指导。

三

《诠释》虽然收录了张家界市土家语地名 2300 多条，但这只是张家界市全部地名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张家界市的地名到底有多少，其中的土家语地名到底有多少，笔者没有办法弄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张家界市的地名绝大多数是土家语地名。这绝非信口开河。

地名是人们用以寻找和识别地物方位和性质的一种代号。它是人的主观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们对自然（身边生存环境）认识的产物。因此，人们对一个地方命名，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人们的语言、文化素养的影响，尤其是离不开命名者所操持的语言。人们一般只会用自己的语言来为一个地方命名。对“海参崴”，中国人叫“海参崴”，而俄罗斯人则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张家界是土家族聚居区，也是土家人的世居地。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加上“汉不入峒”旧俗的影响，历史上这里长期由土家先民“一统天下”，土家语也就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语

言（很可能是唯一通行的语言）。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先民们在辛勤开垦这方水土的同时，也给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根据它们的不同特征取下包罗万象、千奇百怪的名称。因为人是土家人，语是土家语，这些地名就只能是土家语地名了。诚然，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因而会随着社会的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不断发生变化。东汉以降，汉人陆续进入这一地区，带来了汉语言和汉文化，打破了土家人和土家语在这一地区“一统天下”的局面。土家语由于没有文字支撑，根本无法与汉语言和汉文字抗衡，此消彼长，坚守了几千年土家语的土家人转用汉语言和汉文字。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一些汉语地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这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土家先民们留给后人命名的空间——“无名地”已经不多，多数情况是将原来只有语音的土家语地名，变成既有语音又有文字的地名，即将土家语地名循土家语之音用汉字记录下来，给穿上汉语的外衣。但这恰如一个女人穿上男装仍是女人一样，这些地名尽管披上了汉语的外衣，其实质、内涵仍属土家语地名。

张家界地区的地名绝大多数是土家语地名（准确一点说是土家语与汉语结合运用的地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成为张家界人的共识。原大庸县（当时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8年划归大庸市即今张家界市后改为“永定区”），1982年进行了一次地名普查，编印了一本地名录。该地名录共收录地名3567条，但在对地名含义解释时，竟然没有一条说明是土家语地名的。慈利县2007年出版了一本《慈利县地名志》，全书共收录地名2595条，也没有一条说明是土家语地名的。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地名，人们宁肯去瞎猜、胡编，也不愿往土家语方面去想。更有甚者，对一些原本就被误记的土家语地名，不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反而以行政手段将其更名为汉语地名，使其更加偏离该地名的真实含义。如有个县老城区有一条街，原名“毕架路”，“毕架”是土家语 $pi^{35}t\check{c}i^{55}$ （毕基）的误记，汉语义是“土家”；“毕架路”就是“土家路”，多好的路名。可是，2006年县政府却行文将其“规范”为“笔架路”。真是不可思议。现在，全市的市区、县城，对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大搞“穿衣戴帽”工程，以求从建筑方面彰显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对土家语地名却又挖空心思“改土归汉”，岂非咄咄怪事！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越来越显其魅力，已成为旅

游的鸟之一翼，车之一轮。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张家界的土家语地名，从土家语地名入手，深入挖掘土家语言文化和土家语地名文化。《诠释》所收录的这些地名，虽然涵盖了全市两区、两县的全部乡镇，但绝大部分是“村级”，即行政村名，至于“组级”及其以下的地名，由于编著者条件所限，还很少涉及。而“组级”及其以下的地名，在全市地名中显然是大头，而且这部分地名由于“小”，很少见诸文字，因而便少了被误记和讹编的印痕，原汁原味，土家语特色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诠释》做得还很不够，权当抛砖引玉吧！我们期待一部能囊括张家界市全部土家语地名的《诠释》问世！

尚立晰

2015年10月

导 言

张家界市山清水秀，坪坝星罗，气候温和湿润，自古以来就是土家人的理想家园。土家族从遥远的古代一路走来，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土家语地名，珍珠般地缀满了 澧、沅河畔的山山水水。任时光荏苒，云卷云舒，这些地名至今仍绚丽多姿，绽放着璀璨夺目的光辉。

土家语地名作为一种地名文化，承载的是土家人的千古文明，蕴含着土家族万世不衰的民族风情。我们怀着无比的眷恋，在这片土地上拾金掇玉，选择其中的一批予以诠释，只为对那尘封旷久而仍未发生变化的核心习俗的依恋，只为对那古老而又温馨的故园情结和稀释了的乡愁的追寻。

土家族自称“毕基卡”或“毕兹卡”。“毕基卡”或“毕兹卡”，过去通常被译为“本地人”。今天看来，这种译法并不妥切，它的实际含义应是“土著族”或“世居人”。土家族的《摆手歌·迁徙歌》中有一段唱词这么唱道：“……杀日恰过了/红捧那知过了/到了洗口/河中岩石挡住路//……站在船上/看到岸上/岸上是些什么人呢/嘴巴像水瓢/鼻孔像灶孔/脚杆柱头粗/眼睛像灯笼/满脸都是毛/叽叽咋咋笑/身上穿的芭茅叶/头上戴的芭茅草/舞手舞脚/喊喊叫叫/怪模怪样的人过来了///社巴公公走上前/笑眯眯/开言道/天长路远这里来/翻山过水这里来/今朝宝山借路过/借条大路请让开//公公言语实在好/他们叽叽咕咕笑/哩哩喇喇吹起来/叮叮咚咚敲起来/缩手缩脚让开了/闪出一条大路。”这些“怪模怪样”的人，显然就是当地的土著先民。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慈利县的金岩和桑植县的朱家台发掘了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早在 10 万至 30 万年以前，在澧水中上游地区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接着又在桑植县发现了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澧水和 沅水两岸发现了商代以前的居住遗址 200 余处。这些古文化遗址一脉相承，独成体系。1989 年 5 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安致敏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先生特地来到张家界，对同类的桑植县

48处商代遗址明确做出了鉴定，认定这批遗址属二里头文化晚期（即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年左右，是全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类型，建议命名为“桑植文化”或“朱家台文化”。

从198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慈利县的官地和石板、桑植县的朱家台、永定城区等地，发掘了战国至汉代的墓葬300余座，并发掘了多处古居住址、窑址和城址，获得了相关时期的大批文物。经有关专家认定，澧水中上游地区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应是古代濮人，其历史文化应是古代濮人文化。省考古所所长何介钧先生指出：“先秦时期，在湘西、湘西北地区……有百濮民族的一些支系”，“曾经在湘西、湘西北地区长期居留和经营。”湖南省社科院教授田曙岚先生指出：“湘西丘陵地实为古‘卜’人或‘濮’人的宅居地。”湖南省考古所柴焕波先生特地对湘西北地区的濮人墓葬进行了检索，明确指出：“张家界市菜籽湾12号墓”，“慈利官地M5、石板M20”，“还有桑植朱家台战国墓地M3、M4、M10、88M13，都是典型的濮人墓。”

由此，考古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湘西北地区的土著先民就是古代濮人。考古学界并且认为，上古濮人为中古僚人的先民，中古僚人为后来土人的先民，由濮到僚，由僚到土，由土到土家族，构成一条完整有序的历史链条，勾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

考古界的这种认识，与历代典籍对濮人地望的记载也是一致的。据《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时，百濮在商的“西南”。《左传·昭公九年》载：西周时，濮为周的“南土”。《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云：“濮在楚西南。”晋代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氏曰僚子。”

这就清楚地表明，张家界境内土家族的原始祖先是古代濮人。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了这方土地；以后先后融合了庸人、楚人、少量巴人和部分汉人，而成为雄踞一方的“毕基卡”。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创了澧水中上游的历史文明，并以鲜艳亮丽的文化光辉照亮了一方天空。

《张家界市土家语地名诠释》的形成，我们始终按住这条律动着的历史脉搏，力求揭示土家语地名的显性形态和隐性内涵的本质联系，全面系统地拾取土家族的历史资料，从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经济学等等，多角度、多方面地揭示它们

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期达到弘扬土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二

土家语地名,完全是以土家语作地名的称谓。要准确地揭示它的表层形态和深层含义的对应关系,就必须弄清土家语的一般规律。

土家语,土家人称其为 $pi^{35}tsi^{53}sa^{21}$ (毕兹萨)。从古到今,它自然地形成了古代土家语和现代土家语两大板块,但又是一脉相承、联系紧密、彼此不可分离的。这种语言既不同于汉语,也不同于邻近的苗语、瑶语、仡佬语和白语。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缅语族,比较接近于彝语支系的一种独立语言,权且称为“土家语支”,它有 21 个声母、23 个韵母和 4 个独特声调,土家语地名就用这种语言命名。它的基本特征:有辅音,无复辅音;复合元音较多,辅音韵尾较少;词汇有单音词,也有复音词,但以复音词占优势。句子的基本语序有“主语—谓语”和“主语—宾语—谓语”两种结构形式;名词和领格代词作主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形容词定语在被修饰语之后,指示代词位于所修饰的名词之前。

按照传统,土家语一般划分为北部方言区和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主要指湘西自治州的泸溪县潭溪及周边地区;北部方言区则地域广阔,囊括了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边区。两个方言区,语音、词汇、语言结构等都有较大差别,而北部方言区,则语言分歧不大,彼此之间可以通话,可以互相交流。

张家界地区虽然属于北部方言区,彼此之间可以通话,但有的声母、韵母、语音乃至部分词汇,明显存在很多差异,应是实际上的东部方言区。

首先,在声母的发音上,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坐标,北部方言区没有 zh (知)、ch (痴)、sh (诗),而是 zh (知)、ch (痴)、sh (诗) 和 z (资)、c (雌)、s (思) 通用。东部区则 zh (知)、ch (痴)、sh (诗) 和 z (资)、c (雌)、s (思) 十分分明。例如“猴子”,北部方言区发音为 se (色),东部区则发音为 she (舍)。“鸭子”,北部区发音为 sa (萨),东部区的发音则为 sha (沙)。

而对声母 r (日) 的发音,北部区为 ri (日),东部区则普遍为 er (二)。例如表示“长工”的 $xu^{21}zi^{55}ma^{53}$,北部区发音为“胡日马”,东部区则发音为“胡二马”;又如表示“做摆手”的 $se^{53}pa^{53}zi^{55}$,北部区发音为

“色巴日”，东部区则发音为“舍巴二”。

其次，表现在部分韵母上，北部方言区没有 ang（昂），而是 ang（昂）、an（安）通用，都为 an（安）；东部区则 ang（昂）、an（安）分明。东部区 i（衣）、ü（鱼）分明；北部区则 i（衣）、ü（鱼）不分，一律为 i（衣）。例如表示“火坑”的 mi⁵⁵than²¹，北部区发音为“米谈”，东部区则发音为“米糖”；又如表示“绳子”的 ji⁵⁵la⁵⁵，北部区发音为“一拉”，东部区则发音为“玉拉”。

最后，在词汇上也部分地存在着差别。例如“豆腐”，北部区称之为 tie⁵⁵xe²¹（爹核），东部区的溁水流域则称为 xui⁵⁵ma²¹（灰马）。“芦苇”，北部区称其为 kha⁵⁵pa⁵³（卡巴），东部区有的地方则称为 pa⁵⁵uan⁵³（巴完）。又如代词“大家”，北部区称其为 ma²¹li⁵⁵（马里），东部区有的地方则称之为 tse³⁵tchi⁵³（则起）。存在差别的词汇，还可以找到很多。

东部区和北部区土家语的这些差异，必然反映到地名上来。因为发音的不同，也必然会造成地名记名的混乱，同一个地名往往会记出多种形态，得出多种结果。为了科学、规范、准确地认识和记录土家语地名，本书全部以吉首大学副教授彭秀模、叶德书两先生采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结合土家语言制订出来的《土家语拼音方案》为基准，一律以普通话汉字予以注音，这是与以往同类著作采用以普通话结合西南官话张家界地区方言中的汉字语音注音所不同的。这不是作者要标新立异，只是希望它能适应更多的读者。诚然，这些汉字在记录土家语地名时并不表示汉语义，只表示土家语的语音。

三

张家界地区的土家语地名，浩如烟海，璨若繁星，虽然经历几千年风雨，从城市到集镇，从集镇到乡村，今天仍然可以清晰地见到它们的身影。越是偏僻的山区，保留得越是完整；越是交通闭塞的山寨，越是原始，越是纯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土家语地名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人为改造的痕迹，与龙山、永顺等地的原始性比较，就显得“现代化”了。这种现象，愈是往东愈是明显，愈是城镇愈是鲜明。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溯其缘由，当然是多方面的。

张家界地区居于湘、鄂、渝、黔土家族聚居区的东部前沿，邻近汉

区,受汉语影响是其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则与历次战乱带来的历史变迁密不可分。

东汉一朝,张家界地区先后爆发了相单程、陈从、覃儿健、谭戎、羊孙、陈汤等起义;宋代,又爆发了田求、雷德进、廖彦等的“反叛”;元朝至明代初年,有尚俄蒂、向大坤揭竿而起;明代,又有覃亘和土千户夏克武、夏三、夏四等剑指朝廷。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内,历代朝廷都在零阳(今慈利县城)设置大本营,兴兵“征讨”。清朝雍正年间,清廷在土家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制度,派流官实行中央集权。

在这一系列的“征战”和“讨伐”过程中,历代朝廷在今张家界辖区内,先后设立了安抚司、都元帅府、九溪卫、永定卫和两个千户所,并设置多座关隘,长期派重兵驻守。于是就有一批又一批的官兵和汉族官僚进入这一地区,有一批又一批的各类工匠、商贾进入长住,也有一批又一批的汉人为避战乱逃到了这一地区。后来,这些人中有的不走了,成批地在这一地区居住了下来,形成了客家人口体系,分布于城镇乡村。

这样一来,汉族语言和儒家文化也就自然地来到了张家界地区,并逐渐地取代土家语成为当地的主体语言,土家语反倒逐渐地消亡了。表现在地名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对原先业已存在的土家语地名人为改造的刻痕。

土家族有语言但无文字,从前记名时采用的记名符号都是汉字。“改土归流”后,土家人使用的汉语普遍采用西南官话,记名时也是以西南官话中的汉字来对应。这两种语言相差甚远,即使是懂得土家语的人用汉字记音,也很难做到准确无误,更别说不懂土家语的汉人了。

土家语在张家界地区普遍消失较早,不过,在一部分边远山区则是在民国年间才消失。土家语在一些地区消失后,对祖先留下来的土家语地名,人们不再认识也不能理解。记名时,人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因循土家语之音,用汉语之义来想象、猜测、比附和讹编。这样编出来的地名,有的躯壳虽存,含义却变质变味,往往远离本义;有的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似是而非;有的本末倒置,与原义完全相背;有的则完全被改造成纯汉语地名,让人啼笑皆非。例如土家语 $pi^{35}t\zeta i^{55}$ (毕基) 或 $pi^{35}tsi^{55}$ (毕兹),原本是土家族的族称,不懂土家语的人记名时,可以猜测附会出多种结果。张家界境内数以百计的“笔架山”、“笔尖界”、“白鸡垭”、“毕家坪”

和“白支坪”、“拜子溪”、“八子界”等等，多由此附会而来。

土家语地名，既有与汉语地名的共性，更有其独特的个性。命名的题材有天象地理，时间节令；有亲属称谓，人事伦理；有宗教礼俗，军事兵器；有数词量词，处所方位；有服饰食物，医药疾病；有文化娱乐，建筑用具；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有颜色性状，交通工具。这些题材一旦纳入土家族的民族意识之中，就建立起必然的内在联系，很难被人理解，对不懂土家语和土家习俗的人来说，就更是难着边际。例如土家族的民族宗教 $xu^{21}si^{55}tho^{55}$ （服司妥），其本义是“祭祖还愿”，不知其义的人记名时，容易浮想联翩，将其猜测为“虎势”、“浮石坪”、“胡沙寨”或“禾生塔”了。又如表示土家族祭祀活动主祭人的 $thi^{55}ma^{53}$ （梯玛），人们也只好将其附会为“梯木”、“铁马”或“田马”了。

土家语的发音和声调都十分特别，有的词语则更加奇特，没有一个汉字可以与其相当，用汉字记音时人们往往选择与其发音相近的汉字来替代；而近音汉字常有多个，采用时便可有多种选择。这样记下来的地名，必然会有多种形态，会有多种结果。

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以下四例。

土家人称“水”为 $tshe^{21}$ （测），如“出水”称为 $tshe^{21}tsu^{35}$ （测租），“水井”称为 $tshe^{21}mug^{35}$ （测蒙）。但表示“水”的 $tshe^{21}$ （测），其声调并不是高升，而是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三声，汉字中找不出一个字可以与其对应。因此，用汉字记音时，人们多选择“车”、“泽”、“测”、“扯”等近音字替代，而以“车”、“泽”替代的居多。

土家语地名的记名中，有的以“杂古”表示“茶叶”，以“咱木界”表示“蜻蜓”，以“扎”表示“鸡”，以“仁和溪”表示“天南星”。其中的“杂”、“咱”、“扎”、“仁”都是 za 的近音替代字。 za 的原始发音是“日”和“阿”的拼合，其结果是“日阿”。因为汉字中没有一个字与其发音相同，人们只好选择与其发音较近（实际并不相近）的“杂”、“咱”、“扎”、“仁”、“煞”、“杀”、“撒”等来替代，从而衍化出多种形态，但记音都极不准确。

土家语称“锯子”为 khi^{55} ，人们通常记为“去”、“克”或“康”。称“盆子”为 $khi^{55}thi^{55}$ ，一般记为“去替”或“克替”。其实，土家语对“锯子”的原始发音是 khi^{55} （克衣），对“盆子”的实际发音是 $khi^{55}thi^{55}$ （克衣

替)。这 khi⁵⁵ (克衣) 是“克”和“衣”相拼, 汉字中没有一个字与其发音相同, 与之最接近的是“□ (kēi)”, 而这个汉字又不常用常见, 因此人们记名时只好以与其发音较近的汉字来代替, “去”、“克”、“康”等字便是常被选用的对象, 实际并不准确。

在土家语和土家语地名中, 可以经常听到土家人称“缺水”为 tshe²¹ka²¹ (测嘎), 称“吃肉”为 si²¹ka²¹ (司嘎); 称“柴”为 kha²¹ (卡), 称“树木”为 kha²¹muŋ²¹ (卡蒙)。而在书面记录时, 却是 tshe²¹ka²¹ 普遍记为“车家”, si²¹ka²¹ (司嘎) 普遍记为“十家”; kha²¹ (卡) 普遍记为“克”或“客”, kha²¹muŋ²¹ (卡蒙) 普遍记为“克蒙”。这是因为在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之前的几千年间, 土家语虽有“嘎”、“卡”之音, 但通行的西南官话中却并无“嘎”、“卡”二字。在记录土家语时, 人们通常采用“家”、“夹”、“佳”之类的近音字来替代“嘎”, 以“克”、“客”、“空”、“孔”、“科”之类的近音字来替代“卡”。

上述诸种情况, 在张家界地区十分普遍。前人留下来的一些地名资料中, 有不少的土家语地名不仅外部形态被弄得面目全非, 内在含义也大多被讹变和曲解。

为正本清源, 我们首先注重深入的田野调查, 广泛听取土家语地名的原始发音, 对其正音正调, 并从语音、词汇、语法和地名结构等方面加以考辨, 实事求是地还原其原始的显性形态。与此同时, 尽量弄清其得名的由来, 地名的含义, 演变的原委, 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准确地揭示其外部形态与内在含义相互间的本质联系。在此基础上, 对原有地名资料中的误释、讹传、曲解进行必要的纠正, 从而还原土家语地名中蕴藏着但又被泯灭了了的土家族传统文化。

土家语地名, 犹如艘艘航船, 穿过时间隧道, 经过历史无情的淬炼, 捎来了土家族的一路文明, 涉及土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土家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历史, 沉淀着一段历史传奇。为了全面揭示其蕴育的文化信息, 我们十分注意沿用土家语地名文化的载体, 紧密联系土家族的历史实际, 对地名所及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信仰、民族风情、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爱情婚姻、文化艺术、审美情趣等全面的传统文化, 在诠释中尽量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 做出恰如其分的介绍, 尽量使其知识化、趣味化, 使每段历史都可供人观看,

从中参悟出兴替因缘。

张家界作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现已成为对全世界开放旅游地区。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关注着这片热土的建设和未来发展，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古为今用”，直接为现实服务。

尚立昆

2015年2月3日